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

叶文振, 刘建华, 杜 鹃, 夏怡然

(厦门大学 经济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估主要取决于对自我能力的认可程度、母亲和自己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所居住区域的性别文化性质。对自己的能力树立信心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与心理或性格相关联的先决条件, 而教育投入则是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一块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大男子区域文化不仅不合理地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 而且还让处于不平等社会地位中的女性感到自我满足。要进一步改善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妇女自信的心理素质和自强的教育素质的同时, 从社区和社会层面消除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性别文化。

【关键词】女性社会地位; 影响因素; 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29X(2003)05-0022-07

【Abstract】The subjective self-assessment of the Women mainly depends on self-appraisal degree of ability,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mothers and the sexual cultural nature of the inhabitant areas. It is a precondition related to the psychology and the personality for women to establish their own confidence on their ability in order to raise their social status, while the educational input is the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basis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The big man regional culture will not merely reduce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unreasonably, but also make the women who are in the unfair status feel satisfi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 our country, we should dispel the traditional sexual culture with the male power as the core from the aspects community and society while raising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educational quality.

【Key words】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influence factor; regression analysis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均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在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中, 我国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 特别是她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引起了学术界和非学术机构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利用第二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福建样本的资料, 具体描述我国女性对自己目前社会地位的满意程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在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分布, 以及与男性社会地位满意度的对比关系, 并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建构一个包括多层面影响因素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理论解释框架, 然后结合回归估计结果, 提出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我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对策。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前人有关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妇女社会

地位这一概念的科学界定和测量, 以及影响妇女社会地位水平的因素分析。

在概念界定方面, 西方学者把社会地位看成是社会分层的三个构成要素之一 (其余两个构成是财富与权力), 认为它是指他人对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遵从与敬重 (Renzetti and Curran, 2000), 是社会分层中反映社会名望的组成部分。然而, 国内学者不同程度地把社会地位等同于社会分层, 分解出三个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定义: 一是指妇女拥有社会资源的能力和程度 (熊郁, 1995); 二是指妇女所拥有的包括财产、权力在内的社会资源和来自社会的认可程度, 或在社会中享有的威望 (张敏杰, 1995; 蒋永萍, 1993; 沙吉才, 1998); 三是指妇女的比较社会地位, 即相对男性而言, 或以男性群体的社会地位为参照系, 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颜士梅, 1997; 冯立天、陈再华, 1997)。但是, 概念界定不一致似乎并不影响国内学者对

【收稿日期】2002-12-24

【作者简介】叶文振(1955-), 男, 福建福州人, 1991年毕业于美国犹他大学社会学系, 获博士学位, 现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导, 福建女性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 人口经济学, 人口社会学。刘建华, 杜鹃, 夏怡然, 厦门大学人口所2001级硕士研究生。

妇女社会地位内涵相对比较趋同的理解。如颜士梅(1997)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教育地位、法律地位、婚姻家庭地位和生育地位在内的妇女社会地位的六个构成说,冯立天等(1997)的八个构成论,即在把生育地位归入婚姻家庭地位的同时,又增加了劳动、社会参与和健康等三个组成部分,以及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2001)的八个侧面论,即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法律和社会性别观念等,都表明在国内学者的思路里,妇女社会地位主要涵盖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与家庭等领域中的地位。

学术界及有关机构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测度也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例如,1988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会议上,联合国采用以下指标测量各个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包括对女婴的态度、女青年入学率、女性就业率、妇女在领导岗位上担任重要职务的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例等。又如,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1988年采用五大类20个指标评价世界上99个国家妇女社会地位,其中包括健康(如女婴及0—5岁女孩的死亡率)、婚姻与孩子(如女性早婚率)、教育(如中学女教师比例)、就业(男女在有报酬就业中的对比)和社会平等(如经济平等、政治法律平等、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男女社会平等对比)等。还有我国学者利用39项指标构成经济、政治、社会(参与社会发展程度)、家庭和文化等五个客观指标,以及妇女自我认识和发展状况评价两个主观指标,来综合衡量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在分析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时,外国学者偏重于“制度论”,而国内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倾向“差异说”。Blav and Ferber(1986)认为,男女在资源获取、控制和支配方面的权力大小主要取决于男女劳动分工制度。我国学者战捷(1995)则强调,是性别差异导致教育、职业及收入的性别差距,进而影响妇女地位的提高;沈安安(1995)指出,由夫妇自身受教育水平和夫妇教育水平的差异共同反映的家庭文化模式是妇女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还有顾鉴塘(1995)把妇女地位的高低直接归因于夫妻之间的经济收入差异,认为中国广大农村妇女经济收入低和夫妇间收入差额大是农村妇女家庭及社会地位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以上简单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前人研究特别是国内学者的研究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不足:(1)对妇女社会地位的界定,特别是对其内涵的理解过于扩大化,几乎是无所不包,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而又影响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对策研究的深化;(2)测量时所使用的指标及其数量差别都很大,影响了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比较分析;(3)过于侧重社会地位的统计测量,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比较薄弱,且较少考虑宏观层面

因素和个人背景因素的影响作用;(4)较少在个体或微观层面研究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和影响因素。

本研究认为,社会地位还是不要等同于社会分层,也不宜把它仅看成是对社会资源的拥有规模。社会地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被他人或被其他社会群体的尊重程度及其拥有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平等程度。因此,所谓妇女社会地位就是指女性或作为一个个人主体或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被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尊重程度及其所拥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平等程度。一个女性不仅受到社会良好的人格尊重,而且还拥有与他人同等的社会参与机会,那么她就处于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认识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方面,本研究认为,除了把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以外,还应该甚至更有必要把妇女个体作为分析单位,来探讨是什么原因构成了她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妇女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还因为基于微观层面的分析有利于从社会社区、家庭婚姻关系以及女性个人等层面综合认识影响女性社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鉴于此,我们提出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理论解释框架,即每一个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是社区、家庭及个人等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从社会层面来看,城镇地区较快的经济发展和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为女性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多的参与机会,因此,相对于农村姐妹,城镇女性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2)从家庭婚姻层面来看,父母亲良好的教育背景,特别是母亲较高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夫妻间的教育程度差别越大,女性的社会地位就越低;生育子女越多,女性的社会地位也越低。

(3)从个人层面来看,年纪越是比较轻的,教育程度比较好的,自我认可程度比较高的,从事非农工作的,以及经济收入比较多的女性,她们的社会地位也越高;相反,越是持守传统性别意识的,越不利于妇女地位的改善。

二、资料与变量测度

本文资料来自“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这是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继1990年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后组织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型抽样调查。福建省调查涉及36个县、市、区,全国样本526人,占全国样本总数的2.7%,省级追加样本1583人,占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追加样本总数的5.5%,村委会样本131份,占全国4.4%。调查工作持续3个月,共收回个人主问卷2112份,村委会问卷131份,回收率达100%。

表 1 是样本的年龄性别等自然结构和城乡以及行政区域分布。数据表明,福建省调查样本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仅占 1.8%。61.4%的样本人口分布在南平、福州和泉州等三市,各占 22.7%、20.5%和 18.2%。另外,81.4%的被调查对象集中在 20 至 49 岁年龄段。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每一个被调查的女性,样本规模为 1 132。为了进行性别比较,我们也对男性进行相应的检验分析,其样本规模为 980。

从微观层面来看,我们可以采用三种方法来测度女性社会地位这一概念化的变数:一是由一系列具体反映女性社会地位水平的统计指标构成的客观度量;二是用女性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满意程度表示的主观测量;三是客观测度与主观评估相结合的综合度量。相比较来说,第三种的主客观综合测量是最佳的方法,因为它有

机地结合了对每一个妇女社会地位的出自个人的自我评价和来自社会的公共估计。本研究一开始也选择第三种测量方法,但在具体使用因子分析法 (Factor Analysis) 建构妇女社会地位量表时,由于所选择的客观项目或指标各自都有不少的缺失值 (missing values),使它们的交互组合无法集中在几个主要的因子上,最后我们只好另择使用主观测量法。显然,由于每一个妇女对自己要实现的社会地位的期望值或赖以评价的标准都不一样,她们对社会地位满意度问题的选答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相对性,即是相对于各自的期望值或评价标准而言的。例如,“男外女内”的传统性别规范往往会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预期,结果很有可能抬高了她们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满意度。我们将在后续的分析中注意主观测度所隐含的这种相对性的影响。

表 1 调查样本的自然结构与地区分布

项目		人数	比重 (%)	项目		人数	比重 (%)
性别	男	980	46.4	城乡	城镇	1056	50
	女	1 132	53.6		农村	1 056	50
民族	汉族	2 075	98.2	地区	福州	432	20.5
	少数民族	37	1.8		厦门	96	4.5
年龄	18—19 岁	39	1.8		莆田	48	2.3
	20—29 岁	408	19.3		三明	192	9.1
	30—39 岁	787	37.3		泉州	384	18.2
	40—49 岁	524	24.8		漳州	192	9.1
	50—59 岁	255	12.1		南平	480	22.7
	60—64 岁	99	4.7		龙岩	240	11.4
					宁德	48	2.3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妇女社会地位有两种主观测度:一是用被调查者对问卷中的问题,即“总体而言,您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满意吗?”的选答结果,表示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这是一个总括指标,是一种主观的单一的测量。二是用被调查者对三个入户问卷问题的选答结果,经因子分析复合为一个测度指标。这三个问题分别是“您对自己目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满意?”、“您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是否觉得满意(先经过因子分析把被调查者对收入、劳动强度、工作的自主性、发挥自己的能力、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的稳定性等六个工作满意程度复合为单一指标,女性样本的可信度为 0.84,男性样本的可信度为 0.85)”以及“总体而言,您对自己目前的家庭地位满意吗?”。这一测度的男女样本可信度,分别为 0.60 和 0.55。我们之所以要对女性社会地位进行第二种的分项式测度,主要是因为单一的主观总括指标虽然简单明了,但由于比较抽象笼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调查者的选答。多指标分解测度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有助于提高回归分析的效果。另外,教育、就业以及家庭是女性主要的社会活动领域,对这些活动的参与机会和在参与中被尊重的程度是妇女社会地位的基

本内涵,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对所选择的解释变量,我们分别作以下处理和测量:

1、社区变量

本研究所选的社区变量包括城乡、代表不同地域文化的社区以及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居留过的地区等 3 个因素。首先,城乡变量以虚拟变量测度,居住在城里的为 1,其他为 0。其次,我们用两个虚拟变量表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其中,由南平、三明和龙岩三市构成的闽西北样本为参照样本,即居住在福州和宁德市的为 1,其他为 0,居住在莆田和厦、漳、泉的为 1,其他为 0。最后,本文用四个虚拟变量代表调查对象是否去过县城与地区所在市、省城及其直辖市市区、外省和境外,从未出过远门的为比较样本。

2、家庭变量

该组变量有 4 个,即与前面理论假设相对应的父母亲教育程度、夫妻受教育程度的差别(用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减去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和孩子生育数。但为了避免样本规模因过多缺失值 (missing values) 而缩小,特别是使最后的统计验证不仅仅局限于已婚育妇女,而是针对全体女性的社会地位,我们只保留母亲的教育程度这

一家庭层面的变量，且把它处理为数量指标。

3、个人变量

这组变量有 10 个，包括被访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以及 6 个分别反映妇女的自我认可程度和持有的社会性别意识。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均处理为连续变量；职业为虚拟变量，非农从业人员为 1，其他为 0；收入变量因缺失值较多而去掉；与自我认可程度和社会性别意识相关的变量，其中包括对问卷问题“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如果一事无成，我会很不甘心”、“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和“女性应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她的丈夫”的选答结果，也都处理为连续变量，持否定回答的取值小，表示肯定或同意的给值大。选答“说不清”的处理为中间值，以保持样本的容量。

在分析方面，由于被解释变量被处理为连续变量，本文采用 OLS 回归分析方法估计所提出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理论解释模型。我们分别估计相关自变量对女性社会地位两个测度的回归系数，说明各解释变量对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并比较使用不同测度的两个回归模型之间的差别，以验证对社会地位的分解测度相对于总括度量的优越性。以上回归分析还将分男女样本展开，以便进行男女之间的性别比较。为了防止解释变量

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影响模型参数的准确估计，本文将在回归分析前先作必要的统计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1、描绘分析

表 2 是被调查者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总括和分解满意度的性别分布。从总括的社会地位满意度的性别分布来看，虽然男女双方的比较满意及很满意的比例都大于 70%，但女性的比例（76.5%）却高出男性（71.1%）5.4 个百分点，经 X^2 检验还具有统计显著性。这种明显与实际的社会地位男女分布不符的结果除部分归结于总括测度过于抽象笼统的特点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归因于我国男高女低的对社会地位期望值的差异。当我们使用分解测度作比较时，发现其结果有所改善。如对受教育程度的满意度，女性感到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比例（45.3%）比男性比例（48.7%）低 3.4 个百分点，而很不满意的则高出男性近 6 个百分点，约占 16.7%，平均每 6 个被调查女性中就有一个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感到很不满意。显然，这种结果比较接近社会现实。

表 2 社会地位满意度的性别分布（%）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说不清	比较满意	很满意	X^2 检验
社会地位的满意度	男	3.3	23.0	2.4	53.9	17.2	15.68**
	女	1.7	18.6	3.3	60.2	16.3	
受教育程度满意度	男	10.8	38.6	2.0	41.0	7.7	27.12**
	女	16.7	35.7	2.3	35.9	9.4	
工作状况的满意度	收入的满意度	男	16.0	29.9	4.0	41.8	3.28
		女	16.3	30.8	3.0	42.8	
	劳动强度的满意度	男	8.4	22.4	5.7	54.5	2.28
		女	7.1	21.7	5.6	57.0	
	工作的自主性的满意度	男	3.2	9.4	5.4	61.2	4.75
		女	4.0	11.1	5.8	61.0	
	发挥自己能力的满意度	男	6.3	17.6	7.6	53.4	8.25
		女	7.8	15.2	9.7	54.0	
	职业社会的满意度	男	10.8	24.7	7.8	45.8	7.36
		女	11.4	22.4	10.7	45.9	
	工作稳定的满意度	男	12.1	12.1	6.5	48.1	18.16**
		女	9.8	16.2	9.5	51.9	
家庭地位的满意度	男	0.3	3.9	1.0	56.7	38.2	7.68
	女	0.9	4.7	0.9	58.3	35.1	

** 表示在 0.01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 表示在 0.05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 3 女性满意度的地区分布 (%)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说不清	比较满意	很满意	χ ² 检验	
社会地位的满意度	地区 1	1.3	19.4	4.6	61.1	13.5	15.3*	
	地区 2	2.9	15.9	2.6	61.1	17.5		
	地区 3	0.8	21.8	1.9	57.9	17.6		
受教育程度满意度	地区 1	22.2	36.5	1.5	34.5	5.3	24.8**	
	地区 2	14.7	32.6	4.2	39.2	9.2		
	地区 3	15.4	36.9	1.9	34.6	11.2		
工作状况的满意度	收入的满意度	地区 1	14.6	32.7	2.7	44.9	5.1	16.2*
		地区 2	15.8	29.4	4.5	42.3	8.1	
		地区 3	21.7	29.7	0.0	40.0	8.6	
	劳动强度的满意度	地区 1	6.3	25.3	3.9	56.8	7.7	25.0**
		地区 2	6.8	18.5	9.7	56.8	8.1	
		地区 3	10.9	21.3	1.1	57.5	9.2	
	工作的自主性的满意度	地区 1	2.7	8.7	4.8	69.4	14.4	27.4**
		地区 2	4.6	9.5	8.2	60.2	17.4	
		地区 3	5.2	15.6	2.9	51.4	24.9	
	发挥自己能力的满意度	地区 1	5.4	14.5	11.7	56.9	11.4	26.8**
		地区 2	8.6	11.2	11.5	55.3	13.5	
		地区 3	9.8	23.7	3.5	48.6	14.5	
	职业社会地位的满意度	地区 1	10.3	23.3	11.8	46.2	8.5	7.9
		地区 2	12.6	19.9	12.6	44.2	10.6	
		地区 3	14.1	23.5	6.5	44.7	11.2	
工作稳定的满意度	地区 1	7.5	18.1	10.5	51.8	12.0	17.9*	
	地区 2	12.9	17.8	11.9	46.5	10.9		
	地区 3	9.9	12.3	4.7	57.3	15.8		
家庭地位的满意度	地区 1	0.2	6.8	1.3	64.3	27.4	31.8**	
	地区 2	0.5	3.4	1.3	53.0	41.7		
	地区 3	2.3	4.6	0.8	57.5	34.7		

注:地区 1:龙岩、三明、南平市,地区 2:厦门、漳州、泉州、莆田市,地区 3:福州、宁德市。

**表示在 0.01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 表示在 0.05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是,女性对社会地位较低期望值的影响仍然存在。根据同样的资料计算,在所有的职业中,福建女性收入均低于男性,其中差距最大的是农林牧副渔业的从业人员收入,女性只有男性的 41.7%,即使在以知识、学历作为收入分配基础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的年收入也只有男性的 77.5%。另外,在工作稳定方面,女性成为企业下岗的主要对象也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事实。然而,在反映工作状况满意度的 6 个分指标中,有包括收入在内的 5 个分项满意度都没显示出显著的女性低男高的性别差异,而且,女性对工作稳定的满意度反而比男性高,女性表示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比例为 64.6%,比男性的 60.3%几乎高出 5 个百分点。

从教育、工作和家庭分项满意度的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女性对家庭地位的满意度最高,认为比较满意和很

满意的比重高达 93.4%,对受教育程度的满意度最低,只有 45.3%。在工作状况满意度的 6 个分项中,收入的满意度最低,认为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比重只有 49.9%,即平均每 2 个我国妇女中就有一个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水平表示不满意;次低的是女性对职业社会地位的满意度,满意率为 55.5%,满意度最高的分项是工作的自主性,该比重高达 79.1%。所以,我国女性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改善主要依赖于她们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水平和职业社会地位的提高。

另外,对女性社会地位满意度进行城乡比较分析的结果显示,城镇女性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满意度略高于农村姐妹。因此,假如其他因素不变的话,那么城镇化将有利于提高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满意度。

表 3 是被分析对象社会地位满意度在不同区域文化

环境下的比较结果。不论是对总括的还是对分项的社会地位，闽南女性都相对具有更高的满意度（包括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比例），这跟在大男子地域文化中长期形成的对社会地位的低期望值有比较大的关系。福州相对平等的性别传统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的确起到一定的作用，从各项认为很满意的比例来看，除了对家庭地位的满意度以外，福州女性都不同程度地高出其他地区的姐妹。当分地区个别分析时，三个地区的女性都表现出偏低的对受教育程度的满意度（39.8%至48.2%，包括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比例，下同），中等或中上的对工作状况的满意度（48.6%至83.8%），以及相当高的对家庭地位的满意度（91.7%至94.7%）。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各地区女性对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报酬相当低的满意度，换句话说，我国女性社会地位相对低下，主要是她们在教育资源和劳动收入的分配制度中的地位低下，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女性社会地位整体提高的后滞作用。

2、回归分析

表4罗列的是女性和男性社会地位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比较两个女性模型的样本决定系数，即表4中的

R^2 值，我们发现用多项复合测度自变量的模型所解释的女性社会地位的方差为26%，而用单一指标度量的模型只解释7.3%，前者是后者的3.6倍。显然，我们关于对社会地位的分解测度优于总括度量的推论得到了证实。下面我们将用复合测度的模型分析结果来验证本研究所提出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理论假设。

首先，城乡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加快城镇化有利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但是，在福建城镇化的这种正面影响相对比较弱，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福州男性也主内的文化的影响也是正方向的但不显著。闽南大男子传统与妇女社会地位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归因于闽南女性对社会地位较低的主观要求。人口地域流动的作用方向虽与假设相符，但也没有统计意义。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积极作用得到统计证实，其回归系数为0.097，在0.05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说明在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母亲的教育程度每提升一个层次，女儿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就提高10%。

表4 社会地位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总括社会地位满意度		复合社会地位满意度	
	女	男	女	男
社区变量				
1、城乡分类	.023	-.089	.036	-.099
2、福州、宁德地区	-.006	.016	.034	.040
3、厦漳泉、莆田地区	.012	.082*	.085*	.118**
4、最远到过外省	-.036	.095	.013	-.009
5、最远到过境外	.039	.040	.015	.019
家庭变量				
6、母亲受教育程度	.045	.044	0.97*	.106*
个人变量				
7、年龄	.079*	.155**	.031	.125**
8、受教育程度	-.022	-.047	.247**	.155**
9、是否非农从业人员	-.004	.020	-.043	.049
10、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250**	.225**	.346**	.218**
11、如果一事无成，我会很不甘心	-.031	-.009	-0.42	-.002
12、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	-.052	0.60	-.023	.007
13、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	.082*	.029	.079	-.002
14、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104*	-.109**	-.053	.008
15、女性应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她的丈夫	.007	-.067	-.032	-.068
R^2	0.07	0.09	0.26	0.11
F	6.5**	7.0**	15.2**	5.9**
N	1048	878	603	625

** 表示在 0.01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 表示在 0.05 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其次，个人变量中的教育与自我认可变量的影响与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保持一致。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自我认可程度与社会地位的满意度都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回归系数值分别为0.247和0.346，表明妇女自身的教育程度和自我认可程度每往上移动一个台阶，如从高中提

升到大学本科或者从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到有一定的信心，那么她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就会在原来的水平上相应地分别提高24.7%和34.6%。个人的年龄和职业的回归系数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影响的方向与假设相反。我们认为，年龄对社会地位满意度的正面作用是

和年龄比较大的女性具有相对比较低的社会地位期望有关，而非农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满意度之所以比农林牧副渔业从业人员的低，是因为她们要面对更多的男性竞争者，同时她们又具有相对比较高的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另外，虽然与传统性别意识有关的4个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但其中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负值，表明持有传统性别思想多少会影响社会地位的改善。

最后，通过表4第三、四栏结果的对比，我们发现男性模型的解释力比较弱， R^2 值只有11%，不到女性模型的一半。另外，闽南男权文化明显地提高了男性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其回归系数上升到0.118。而且在男性模型中，年龄的影响也变得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也在明显地上升。

四、结 论

本文利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资料，对所提出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多层面多因素解释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分析结果部分地证实了本文的原假设，所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我们认为，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方法论上来说，对社会地位进行分项复合测度有利于增强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在使用主观测度时，要注意把握主观测度所隐含的相对性的影响。(2)从理论上来看，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估主要取决于自我的认可程度、母亲和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所居住区域的性别文化性质。在现实当中，女性社会地位偏低不仅仅是因为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凭借制度或文化对有限资源和机会的超额占用，而且还因为女性本身对自己能力缺乏信心而主动放弃本来就不多的参与机会。因此，对自己的能力树立信心是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一个十分

重要的与心理或性格相关联的先决条件。母亲和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与女性社会地位状况的密切关系则告诉我们，教育投入是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一块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大男子区域文化对女性社会地位满意度的正面影响提醒我们，男权文化不仅不合理地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让处于不平等社会地位中的女性感到自我满足。(3)从政策上来讲，要进一步改善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妇女自信的心理素质和自强的教育素质的同时，从社区和社会层面进一步消除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性别文化。

【参考文献】

[1] Renzetti, C. M. and D. J. Curran, 2000, *Living Sociology*, Needham Heights: Allyn and Bacon, p. 197.

[2] 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 蒋永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全国卷一）[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

[4] 沙吉才·中国妇女地位研究 [C]·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

[5] 冯立天、陈再华·北京城市妇女地位调查研究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 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J]·妇女研究论丛，2001，(5) .

[7] Blav , Francimed and Marinne A. Ferber : *The Economics of Women, Men and Work*, 1986.

[8] 战捷·性别差异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A]·当代中国妇女地位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9] 顾鉴塘·中国夫妇经济收入差异 [A]·当代中国妇女地位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傅 苏]